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8

余华和森鸥外的女性观对比

——以《文城》和《雁》的女主形象为中心

王云樵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追寻自我觉醒与情感解放的女性”作为近代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不仅在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熠熠生辉,亦在男性作家笔下得到独特诠释。余华和森鸥外作为中国现代和日本近代的先锋作家,分别在《文城》与《雁》中凝聚了自己独特的女性观。两部作品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既延续了男性凝视的传统框架,又通过叙事语调的置换通过女主视角传递内在声音,从两位女主人公相似又不同的人物形象中,既诉说着近代中日女性自我觉醒的现实与幻觉,亦映射出两位作家截然不同的女性观。

关键词: 余华; 森鸥外; 《文城》; 《雁》; 女主形象; 女性观

一、《文城》与《雁》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杰出的作家,被广泛评价为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开拓者。余华的创作蕴含近代价值观与传统伦理观、价值观之间的决裂,体现对传统文化的叛反,正如先锋文学特征,他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通过离异既定的秩序,从中宣布自己的主体性,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1]366}。

森鸥外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双壁之一,从德国留学归国后以昂扬的姿态在文坛崛起,为明治初期的日本社会带来了启蒙之风,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和开辟者。如刘娟所述,“鸥外的创作选材广泛,内容常常围绕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体现了当时日本新旧思想的对抗与融合,与明治时代精神及其内在矛盾冲突相吻合,也与明治时期近代文明的曲折发展趋势相符合。”^{[2]3}

在“封建与近代的思想碰撞”这一主题上,余华和鸥外的创作可谓不谋而合。在《文城》之前,余华凭借《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名声大噪。但如郭晓雨所说:“其中的女性不是‘贤妻良母’就是‘娼妇’,对女性身份的简单化处理使得她们身份单一、形象雷同,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缺乏自我而显得空洞。”^{[3]101}然而在《文城》中,这样的女性书写迎来了转变,小美复杂又矛盾,其形象充斥着对自我的追寻,体现着对女性自我的关注。而在《雁》之前,鸥外最有名的作品当属《舞姬》《泡沫记》《信使》的浪漫三部曲。这三部作品都是鸥外以自己留德期间的生活体验为来源的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爱丽丝、玛丽、伊达分别作为三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在鸥外笔下都拥有着强烈的近代性自我。然而她们三人的自我更像是一种“飞来之物”,充满不真实感。鸥外将女性作为背景板,通过三位女主人公与生俱来的自我推动故事发展,传递自己内心的自我纠葛。直到《雁》的诞生,鸥外才首次描绘出了一个生活在日本近

[作者简介]

王云樵(2000—),男,四川泸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基金项目]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以象征符号似的叙事诉说现实和幻觉——《雁》与《文城》中女主形象的比较研究”(编号: SISU2024YZ027)。

代社会现实的女性，小玉深受束缚却向往自由，传达着女性的自我困境。

因此，在《文城》和《雁》之前，余华和邬外塑造女性形象的时候，可以说都是无意识地把男性对女性的某种期许，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寄托在女性的形象上，让这些女性的自我意识缺失，更多的是对男性的一种服务，一种虚无的自我存在的丧失。而《雁》和《文城》作为二人创作生涯中首部也是唯一一部包含女性主视角的现实小说，矛盾又立体的两位女主人公体现着邬外和余华女性书写的转变和对女性群体的关怀，从中更能够观察到邬外和余华在现实中各自的女性观。

二、于他者境遇中挣扎的自我

在余华和邬外的笔下，《文城》和《雁》的故事均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传统与近代碰撞时期，而主人公的小玉与小美作为生活在底层的社会女性，在生存轨迹中被异化为“他者”，经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边缘化。

小美和小玉作为底层人家的女儿，出于艰苦的现实条件而经受着生存上的压力，两者既面临着物质资料贫乏导致的生存困境，又在苦难和困境中被家人定义，受限于所赋予的身份之中，生存空间由此遭到限制。小美在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荼毒的家庭之中，被父母当作“贤妻”培养；小玉在受前近代思想侵蚀支配的父亲影响之下，作为“艺妓”成长。

为了解决生存困境，两人最终都成为了家庭的牺牲品，殊途同归于一条道路——“出嫁”。事实上，在“出嫁”后，小美和小玉的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但小美成为童养媳，小玉则成为小妾，虽是“出嫁”，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妻子”，在新的身份幻觉中，两人同时面临着新的现实生存困境。

小美和小玉在各自的现实中带着被赋予的身份嫁到了富裕人家，成为了“妻子”似的附属物。小美在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荼毒的家庭之中，被父母当作“贤妻”培养，最终沦为沈家的“童养媳”；小玉在受前近代思想侵蚀支配的父亲影响之下，作为“艺妓”成长，最终沦为末造的“妾”。

二人同样作为贫穷人家的女儿和富贵人家的“妻子”，成为了原生家庭的牺牲品和婚姻的附属品。在这样的现实中，二人在他者境遇中愈陷愈深，在二人身上由他人打上的本应是幻觉的烙印逐渐加深，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为现实。

而小玉和小美面临苦难和困境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指向自我的，正因存在自我的挣扎，才有悲剧的诞生。小玉和小美置身于他者境遇中，作为附属品受到支配，在成长阶段，二人被周遭当做他者凝视，在这个过程中两人都失去了自我，成为了“艺妓小妾”和“贤妻良母”之幻觉的现实载体。

然而，小美和小玉却不只是逆来顺受，出于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小玉和小美都在他者境遇中挣扎着寻找自我。小美在林祥福这一他人的爱和尊重下，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通过外省寻回了自我。小玉则以父亲和末造为契机，向冈田勇敢求爱，在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中通过内省抵达了自我。哪怕小美和小玉的自我觉醒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终究无法逃离破灭的结局，却也是二人挣扎的象征。

林祥福将小美视作主体，小美却在“生育的性”的肉体记忆下，将自己视作他者。小玉为了满足自我欲望察觉到“主体的性”的肉体记忆，她将自己视作主体，却被冈田视作他者。无论是小玉还是小美，都没有摆脱传统规范中“贤妻良母”的精神记忆，也没有冲破家族制度的藩篱。在余华和邬外的笔下，小美和小玉都呈现出追求自身欲望的“主体的性”，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生育的性”在二人的肉体记忆中占绝对地位，更没有将“主体的性”作为武器来倡导。

这样的形象设计一方面是男性作家女性书写局限性导致的必然，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二人共同的“压抑—觉醒—破灭”的自我觉醒轨迹，却存在“外省式觉醒”和“内省式觉醒”之分。外省式觉醒的小美走不出的是自己内心的围墙，内省式觉醒的小玉打不破的是外界环境的束缚。看似相同的人物轨迹，但外省式和内省式之间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两位作家内心的女性定位及女性观蕴含其中。

三、源自现实的美好祝愿——余华的女性观

作为男性作家，余华在创作之时很难站在女性的立场进行思索，就如余华自己所认为的“女性心理不好把握”，这与其男性视角的局限、个人经历的得失有着密切的联系^{[4]36}。此前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贤良顺从的典范，还是庸俗放纵的符号，抑或冷漠无情的化身——本质上是基于男性视角的想象建构，服务于不同维度的男性需求。这些角色多被框定为妻子、母亲、女儿或寡妇等身份，其存在意义完全依附于男性角色。一旦男性角色消失，女性便沦为空洞的叙事工具，既丧失主体性，亦失去言说内心的话语权。此类形象实为传统男权观念在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具象化体现，折射出女性价值被规训为服务男性的功能性存在。

但是这样的女性观在《文城》中窥见了转向。小美不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跃然纸上，女性也从被男性角色操纵的客体之物变为了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形象。正如张静怡所说，“小美不同于余华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她不是余华作品中常见的‘善之母’‘恶之花’”，也不属于‘刷之羊’，她在封建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又在话语权的争取与放弃中萌发出新的自我主体意识。”^{[5]33}

小美的形象承载着自我意识的深层矛盾，既渴望冲破封建枷锁，又深陷传统规训的泥潭。其挣扎过程凸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独特价值。余华通过这一角色，既展现女性生存的艰难，又揭示其自我意识从萌芽到衰落的悲剧性。小美既非完全符合封建伦理对女性的期待，亦未真正融入女性解放的叙事，其“物化”与“半从属”状态折射出转型期女性的身份撕裂。

余华对小美命运的安排充满悖论，引发读者“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的双重情感，最终导向对角色命运的深刻共情与反思。在其笔下，所有生命皆试图反抗命运束缚，小美对“文城”的追寻正是这种抗争精神的缩影——即便结局注定虚无，仍执著于突破生存的边界。

“文城”是虚幻的，象征着近代女性无法抵达自我的现实。同时，虚幻的“文城”也象征着余华对女性处境的美好寄托。在对人性真善美这一主题的追求下，余华作品中的生命都在奋力挣扎，试图摆脱命运的束缚，他们每个个体生命背后都具有一种来自本身的对抗命运的强大力量，向往文城的小美也不例外。正如日译版中，《文城》被译为《梦幻の町》（梦幻之城），“文城”虽然只是幻觉，却承载了在现实中，余华对女性解放的关怀。即便现在仍是幻想，但在真善美人性的指引下，就像文中阿强所说：“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6]330}相信终有一天，梦幻会成为现实。

四、幻觉背后的潜藏真相——鸥外的女性观

鸥外以“雁”为题，暗示“雁”的命运象征着人物的命运。而“雁”是群居动物，在迁徙时习惯成群结队。一只“雁”的死象征着小玉的悲剧命运，而在那一只雁的背后，还有无数只雁的存在。因此，“雁”实际上正是近代日本社会广大女性的象征。

在“雁”之中，鸥外看到了在传统精神下女性的处境，以及她们自我的挣扎和生活的苦难，而对于代表了这一切的小玉，他安排了冈田这一男性来成为她的希望。冈田可以说是鸥外本人的化身，一方面，他是帝大的医学生，向往着西方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立身处世的功名之心和家国情怀驱使维护国家秩序。冈田可以说是处于近代与封建的交叉路口，代表着明治初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

鸥外本人也正是如此，其思想则呈现出传统与近代的撕裂。作为率先接触西方思想的启蒙家，他试图赋予女性觉醒的可能性，但自幼浸润的封建伦理又使其无法彻底接纳女性的真正觉醒。这种矛盾投射在小玉的形象塑造中，他清楚“艺妓”和“妾”应是被留在过去之物，却还是在小玉身上刻下了烙印；他既以细腻笔触刻画其自我，又以“被击落的雁”隐喻其觉醒的夭折。最终，小玉眼中的“无限遗憾”及悲剧结局印证了森鸥外的保守立场，他欣赏的仍是封建伦理规训下的“人偶式”女性美，而非真正独立的女性人格。

矶贝英夫在评价《雁》时指出：“小玉是一位‘总是很温顺的’对于父亲所说的话‘百分百同意’的女子^{[7]68}。森鸥外笔下的少女小玉被赋予‘闺阁式’的纯净特质：涉世未深、性格恬静，其外在形象始终保持着传统审美下的“洁净之美”。这种刻画透露出作者对女性形象的理想化投射，他将小玉的“美丽”神圣化，实则暗含对封建伦理中“未觉醒的女性美德”的迷恋。尽管鸥外明白“艺妓”与“妾”是应被留在过去之物，但他还是无法违背内心的价值观。

这种思想的双轨性导致其女性观的内在冲突：理性认知支持女性解放，情感深处却固守男权秩序。他试图通过“矛盾的调和”自我安慰，实则暴露了近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困境。于是最终鸥外找到了二者最佳的融合点，那就是女性有“意志”地自我“牺牲”。正如文中对小玉的心理描写：“小玉当初除了想让父亲享享福，没有任何别的念头。勉强说服了固执的父亲，做了人家的外室。只当成一种不得已的堕落，在利他的行为中求得一种心安。”^{[8]359}这也是他“利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体现，他只能以一种与自己最为契合的矛盾的女性观来自我安慰^{[9]36}。鸥外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可见一斑。

所以，他看似赋予了小玉“媚妇性”的“艺妓”外表和身份，让小玉勇敢追求自由和欲望，实际上却往小玉身上刻下“贤妻良母”的精神记忆；好像给予了小玉自我觉醒的希望，却又通过冈田这个化身扼杀了小玉的自我。结合鸥外贯穿创作生涯的“諦念”（放弃）思想，他对待女性就像冈田看待小玉一样，更多的是站在消极的旁观者角度。冈田面对小玉的感情选择出国留学的情节与鸥外另一部作品《舞姬》中丰太郎为了前途抛弃爱丽丝的情节高度相似，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鸥外的创作核心始终围绕他“自我的自我”，《雁》也不例外。

“雁”作为汉字在日语中有两个读音，但鸥外的《雁》发音同日语中的“癌”，考虑到鸥外精通医学，这也

许是他故意为之。但从另一方面考虑,如若读作“癌”的“雁”只是巧合,那一系列的偶然,或许也在无意中代表了他思想中的毒瘤。鸥外看似拥有先进的女性观,但其中的先进不过是幻觉,现实是隐藏在背后的落后的女性观。

五、结语

《文城》与《雁》在各自的视域下针对女性的自我做了系统描绘,通过小美和小玉在苦难中挣扎的自我,传达了作家对“女性自我觉醒与情感解放”的思考。余华和鸥外在叙事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男权语境的条条框框,批判落后的封建伦理观点,虽然小美和小玉对自我的追寻最终都化为幻觉消逝在了现实,但通过她们的命运轨迹,两位作家在传达女性意识、引发读者深思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女性生存的关照。

“雁”是有生命之物,鸥外赋予了它们翅膀,最终却没有让它们飞翔。自由幻觉背后的残酷现实象征着鸥外看似先进实则落后的女性观。“文城”是无生命之物,没有自由甚至不存在于现实,实际却承载着余华对女性解放的美好寄托。虚幻的现实背后是余华近乎乌托邦式的美好祝愿和积极的女性观。

鸥外身处特殊的历史时代中,他身上的矛盾特质及女性观并不仅是他自己一人所独有的,作为社会精英的鸥外代表着近代日本的上层建筑。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坛拥有独一无二地位的成就,在通过文字引起读者共鸣这一点上,他的观念也代表着社会的观念。然而同样是医生的身份,鸥外出生医生世家,是高高在上的陆军一等军医;余华出生县城,是名不经传的卫生院牙科医生。二人立点的不同导致了代表阶级的不同。代表时代意志的鸥外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维护统治的封建伦理,代表平民百姓的余华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的自由向往。从这种象征性中,再次暗示了余华与鸥外二人积极和消极对立的女性观。

参考文献:

-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 [2] 刘娟.森鸥外小说创作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2.
- [3] 郭晓雨.丧失自我的空洞存在——探析余华作品中的女性观[J].名作欣赏,2022(12):101-103.
- [4] 郝欣如.从女性书写的转变看余华的女性观[J].今古文创,2022(23):34-36.
- [5] 张静怡.女性生存困境的现代书写——以余华《文城》中的纪小美为例[J].文学观察,2023(10):31-33.
- [6] 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21.
- [7] 磯貝英夫.『雁』のお玉[J].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59(4):67-71.
- [8] 森鸥外.森鸥外精选集[M].高慧勤,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 [9] 么淑云.森鸥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u Hua and Mori Ōgai's Views on Women —Focusing on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in *Wencheng* and *The Wild Geese*

Wang Yun-qiao

School of Japanese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The theme of "women in pursuit of self-awakening and emotional liberation," as one of the core motifs in modern literature, shines not only in the works of feminist writers but also finds unique interpretations in those of male authors. Yu Hua and Mori Ōgai, as pioneering figures in moder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have crystallized their distinct perspectives on women through their novels *Wencheng* and *The Wild Geese*. While both works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the male gaze in shaping female characters, they simultaneously subvert this paradigm by employing shifts in narrative tone to amplify the inner voices of their protagonists.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these heroines—similar yet divergent—the novels articulate the realities and illusions of women's self-awakening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while also reflecting the authors' strikingly contrasting views on femininity.

Keywords: Yu Hua; Mori Ōgai; *Wencheng*; *The Wild Geese*; Female Protagonists; Views on Women